

中国城市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

吴晓刚[†]

摘要：1930 年代燕京社会学人首次将“社区”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并结合当时中国国情，以田野个案研究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本文称之为“社区研究”1.0。自 1990 年代以来，城市中国已经崛起，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口生活在城市中。传统单位制的衰落，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基层治理面对种种挑战，城市社区研究的意义重新被重视。现时代我们结合在香港、上海、广州开展的包括邻里街区、家庭和个人等多层次的追踪调查项目，提出“社区研究”2.0，认为一方面是将以个案为传统的社区研究升级到多个社区的定量比较分析，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定性转向定量，从个案研究转向量化数据甚至大数据，另一方面要将分析大规模抽样社会调查资料的定量研究置于更加地方化的情境，通过城市社区实证研究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

关键词：城市调查 定量分析 社会学中国化 社区研究 燕京学派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958-8006(2024)01-0001-23

* 本文是基于作者于 2018-2019 年受邀在华中农业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学术讲座的主要内容而撰写成文。作者感谢孙秀林、缪佳、郑冰岛提出的建议，以及上海纽约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的支持。仅以此文纪念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 100 周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帕克 (Robert E. Park) 访问燕京大学 90 周年 (1932-2022)，并庆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四十周年。本文的一个早期版本，“社区研究 2.0：定量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做‘深’”，曾刊登在《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 27 辑 (版权仍为作者所有)。作者感谢集刊主办单位慨然允诺将文章扩展补充再刊。

[†] 吴晓刚，上海纽约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纽约大学社会学系，email: xw29@nyu.edu。

Urban Social Survey and Community Studies in China

WU Xiaogang

Abstract: Yen-ching sociologists first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into China, promoted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through ethnographic study of communities, and yielded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in the 1990s. This is what we called Community Study 1.0. Since the 1990s, more than half of Chinese national population has lived in urban areas. The decline of the work unit system and the influx of rural migrants into cities have posed great challenges to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ommunity has been rediscovered in the new contexts. Based on the multi-level and longitudinal survey projects conducted in Hong Ko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mmunity Study 2.0 in China. The Community Study 2.0 is to move from rural communities to urban communities, from qualitative to quantitative methods, from individual cases to quantified survey data. or even “big data”, and from traditional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s to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multiple cases. The Community Study 2.0 can also help to situate empirical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into a more localized context to understand social change in urban China.

Keywords: Community Studies,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Quantitative Analysis, Urban Survey, Yen-ching School

一、引言

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相比，中国社会学得风气之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建伊始，就直接引进和接受了定量研究方法，也最早践行以基于全人口的概率抽样调查方法来获取数据，通过数据分析，获取关于真实社会世界的知识。然而，定量社会科学研究长期以来在低水平上低质量地重复。到本世纪初，以高校社会学为主力推动建立起来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综合性学术数据库的建立，为定量社会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越来越多的在海外受过系统方法训练的学者，回到国内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加上不同高校开办的暑期训练班，大大促进了定量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传播与应用，迅速提升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化水平（Wu, 2009）。

定量社会科学研究表面的繁荣也导致了国内不少从事定性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同仁的批评，曾经再次掀起过关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抽样调查与个案田野的方法论之争，进而更延伸到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讨论（参见边燕杰，2017；王宁，2017；谢宇，2018；周晓虹，2018）。虽然社会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将定量社会学等同于西方社会学，未免过于简单化，但是基于大型抽样调查的定量分析对地方化情境的忽视，浮光掠影，“不接地气”，似乎也是其天生的缺陷。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如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等数据库，有其综合性的优势，但最大的短板就是针对性不强，因为中国的地区差异实在太太大，对全国具有代表性，必然丧失一些地方个性的题目。因此这些调查研究和分析结果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显得有点差强人意，对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贡献也非常有限。从事定量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需要正视这些问题，向定性研究学习，思考如何将研究做得更加“接地气”，体现研究问题的“前瞻性”、研究方法的“引领性”、研究设计的“精致性”。

在讨论一门学科如何引进和发展，在中国生根发芽，历史是最好的一面镜子。社会学自20世纪初引入中国，从刚刚开始译介，到美国传教士社会学（American Missionary Sociology），再逐步走向本土化的过程，燕

京大学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先例（Chiang, 2001; Wong, 1979）。燕京大学社会学早期教学和研究主要是以社会调查为主，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在北京所做的有关人力车夫的调查和中国学者李景汉在河北定县所作的民生调查，均属此类。这类资料搜集（虽然还非现代意义上的抽样调查），对记录了解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社会服务，实施社会改造，不无助益。随着一批在西方受过训练的中国学者的回归，社会学研究本土化的议题开始受到关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学派”，提倡社区研究，关注农村社会、乡土中国，以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和定性分析来探究社会制度及其内在机制，实际上是对早年燕京大学传教士社会学（Missionary Sociology）所积极推动的社会调查活动的一种修正和超越。在吴文藻看来，无论是定县社会调查，还是北京人力车夫调查等，都是对社会情况的搜集和描述，没有理论的指导。社区研究在推动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本土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曾经创造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段辉煌时期（张静，2017）。本文将之称为社区研究的 1.0 版。

本文认为，1979 年社会学重建以后的社区研究，无论在议题上还是在方法上基本上是在重复 1930 年代的社区研究。由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中国社会时空的变迁，社区研究需要从以个案为传统的社区研究 1.0 升级到转向需要多个社区定量比较分析的 2.0 版。中国社会学研究需要置于地方化的特定情境，需要更加“接地气”的研究，可以通过“社区研究” 2.0 来推进。

二、社区研究 1.0

中国社会学中社区研究的发展，与自 1933 年后由吴文藻出任系主任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及其学生包括费孝通等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城市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密不可分。两者的联系是通过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帕克 1932 年秋对燕京大学的学术访问建立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帕克的来访，协助奠定了以社区研究为特色的“燕京社会学派”的基础，也是燕京师生第一次为英语世界中的 Community 创造了一个新的中文词汇——“社区”。比较有趣的是，芝加哥学派都市研究的兴起，是因应上个世纪初美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口集聚带来的诸多社会问

题而产生的。而帕克所启发的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则是面向中国农村单个社区的。他认为，因为美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要了解美国社会的本质和特性，必须研究都市社区，故他以芝加哥为基地指导学生做都市社区研究。而中国当时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建议中国学者应该集中精力研究乡村社区。作为那个时代一位具有罕见的国际视野的社会学家，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都市问题，因此西方社会学的实验室是都市社区；而东方社会的问题本质上则是乡村问题，故中国社会学应当以乡村社区为实验室（Chiang, 2001；阎明，2004）。¹

芝加哥城市社会学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将“人文区位学”分析应用到崛起的城市中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研究中。虽然对空间因素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早期社会统计学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些经验研究，真正使之登堂入室者始于 100 多年前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帕克和博吉斯所著的《社会学科学导论》一书（Park and Burgess, 1921）。² 他们以在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崛起的中部大城市芝加哥为观察实验室，研究城市中形形色色的社会行为的空间环境背景，将以邻里为中心（neighborhood-centered）的研究带入了学科的前沿，强调城市中社会分化呈现的空间性，从而开创了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许多学者对不平等与贫困、犯罪和越轨，甚至居民健康等大量的经验研究，展示了其空间集中的特性，通常称之为“邻里效应”或“街区效用”（Neighborhood Effect）。芝加哥学派关注街区层次的结构分化，多种看似不相关的社会现象空间的积聚，以及空间因素对个体行为影响的社会机制与过程，对美国社会学研究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城市研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Park and Burgess, 1925[1967]；Sampson, 2012；Sharkey, 2013）。

有趣的是，Community（社区）这个概念，在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中，并非占据核心位置。然而，在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史上，“社区”这个概念有着特殊的地位。社会学这门学科正是诞生于十九世纪末那场巨大的

1. 当然，帕克本人对中国的城市社区研究也情有独钟。虽然当时城市生活并非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在燕京大学访问时，他也鼓励学者和学生将当时的北平（北京）作为社会实验室，研究 1930 年代快速变化的社会关系。帕克认为北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直到晚年还一直惦念再次到北平开展研究。

2. Earnest W. Burgess 中文译为“博吉斯”，与燕京大学时期 John Stewart Burgess（步济时）之姓重合，纯属偶然。

社会转型对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纽带的破坏。这场转型被德国社会学家费尔南多·滕尼斯在其名著《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概括为从社区（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的转型（斐迪南·滕尼斯，1999）。英文将 *Gemeinschaft* 翻译成 *Community*，而正是帕克将这个术语介绍给当时的燕京大学师生，进而创造了一个新的中文术语——“社区”（丁元竹，2020）。³ *Community* 原本并不包括空间、区位的涵义，更多指基于初级关系的共同体。经典社会学家，如涂尔干、韦伯以及齐美尔，都对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社区”（共同体）精神的衰落表示出极大的关注。现代城市社会的兴起，本质上是对社区性的反动，或者说，现代（城市）社会关系的匿名性（*anonymous*）、表面性（*superficial*）、暂时性（*transitory*），不可避免地导致“社区”精神的弱化，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导致社区的衰落（*Wirth*，1938）。因此，芝加哥学派关于邻里效应的研究，是基于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的假设出发，认为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变迁反映在社区层次上，是社会解组，即个人关系、自愿团体和地方机构遭到破坏，削弱了社会化和社会控制必需的基础设施，从而最终导致种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这些社会问题具有空间分布的相关性，对城市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西方学者们在研究当代城市社会问题的时候，也呼吁对社区的回归，对邻里关系和社会资本的重视，如詹姆士·科尔曼正是基于对家庭—邻里关系对儿童学业成绩影响的经验研究而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著名的社会学概念（*Coleman*，1988）。

可见，关于城市邻里效应的研究和社区研究，在西方社会的情境下，具有本质上的张力。燕京大学的学生，创造性的发明了“社区”这个中文新名词，引进空间的因素，一方面可能是受到芝加哥学派生态学视角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契合了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即帕克主张的乡村社会研究。简单地说，社区这个概念包括“社”和“区”两方面的属性，即指以地区为范围，人们在地缘基础上（“区”）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社”），用以区别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亲属群体。定义一个社区，空间、区位是外延，社会联系互助是内涵。但是，*Community* 的英文本意，更强调的是其“社”性，而非“区”性。西方城市社会学中关于“街区效

3. 此之前，有些学者将 *Community* 翻译成“地方社会”，参见丁元竹（2020）。

应”的经验研究，更着重的是“社区”的空间（即“区”）属性。城市中住在一个特定的小区内的人，未必一定需要有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也未必一定没有社会交往和联系。我们可以空间为基础来研究当代中国城市，把邻里的“社”性当作一个经验性的问题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吴文藻带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提倡的社区研究，主要集中在村落个案研究，“社”和“区”基本是重合的。针对单个地域社会的田野研究和观察，大多是在农村或近郊农村地区，可以说是典型的社区。

尽管帕克鼓励并带动燕京大学师生运用个案方法进行实地调查，也是燕京学派社区研究的取向，吴文藻所倡导的“社区研究”，并非简单地模仿移植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了社会学研究本土化的议题。他引入由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创立的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理论，主张通过社区研究，以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去理解一个社区，就像“解剖一只麻雀”。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不少燕大学生到西方求学，学成归来，从事社区研究，产生了一批丰硕的成果。“燕京学派”的代表性研究，如林耀华的《金翼》、《凉山夷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张子毅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等，均是针对单个地域社会的田野研究和观察（侯俊丹，2021；杨清媚，2015）。这些地域大多是在农村或近郊农村地区，故称之为“社区”，并无不妥。

吴文藻对社区研究有着自己的特别偏好，甚至认为社会学就是研究社区的。在他看来，早期燕京大学所从事的“社会调查”着重记录和描述，而社区研究则注重对事实的解释和原因探讨。吴文藻（2010[1936]）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一文中，梳理了社区研究的五大来源，即社会调查、文化人类学、人文区位学、地域调查运动、文化社会学，认为五者之中，又以文化人类学为最重要。由此，他主张借鉴社会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关注文化和制度在社区生活的作用，将焦点集中于“组织”和“心态”，对中国的社会团结机制做出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和解释奠定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方向，而他和追随他的学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展的研究也基本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分析和讨论的问题主要停留在学理层次，用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的概念，把一些社会现象发生的前因后果说清楚。美国社会学城市研究中的

芝加哥学派和中国社会学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之间，除了一个人（帕克）和一个名词（“社区”）的之外，其实并没有太多学术上的关联。

尽管借鉴社会人类学功能主义的理论，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还缺乏一个清楚的比较研究框架。吴文藻门下弟子所作的田野研究工作，大多是相对独立的个案。以个案为主的“社区研究”，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研究者难以获取社会层面的数据，因而只能通过“解剖麻雀”来了解社会体系运行的机制。⁴ 1979年以后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过程中，费孝通先生发挥了领导作用（Arkush, 1981）。可能是受他的影响，这种类型的社区研究起步较早，一直占据了国内社会学研究的主导地位，而且还延展到对城市社区的研究。

这样的研究传统（社区研究1.0），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每个研究都是个案研究，而个案之间的差异没有可比性，知识很难积累。第二是研究讨论主要停留在学理层次，用一些社会学的概念，把一些社会现象发生的前因后果描述清楚。事实上，“社区研究”1.0运用功能理论和社区研究的方法，主要关注的是“文化”和“制度”，而不是“社区”问题的本身。

三、社区研究 2.0

学术研究和发​​展本来就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社区研究需要比较，因为不同的社区是不一样的。在“燕京学派”开启中国“社区研究”后的八十多年的时间里，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方法和技术手段都可以为社区研究注入新的元素。如何整体把握和刻画社区间的异质性，跳出社区的个案思维，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自然不能少。燕京学派社区研究的贡献之一是赋予“社区”这一中国词汇新的涵义；贡献之二是以特定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做出了对中国传统村落社区的一系列经典研究。随着学科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社区研究需要更新提升。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研究固然有用，而在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公共治理的角度上，我们更强调把握社区的异质性及其对个人结果的影响。这种基于城市社区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搜集和分析，我称之为“社区研究”2.0。

4. 当然，比较社区研究也已经在吴文藻的研究议程中了，有一点类似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提出的扩展个案法（Burawoy, 1991；卢晖临、李雪，2007）。可惜由于战争和政权变更，以及其后社会学在1950年代被取消学科地位，此一学脉无法延续更进一步发展。

首先，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也在不断发展。195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学的城市研究大多继续承袭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对各大城市的社区分化进行描述和分析，验证芝加哥学派的预言，即城市中的区域分化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以及种族的高度相关性。如舍维克和贝尔（Shevky and Bell, 1955）提出了“社会地区分析”（Social Area Analysis）的构想，认为城市的（个体层次）社会分层表现在街区（Neighborhood）分化的差异上，并基于人口普查小区数据，提出了社会等级（Social Ranking），城市化/家庭地位（Urbanization/Family Status），以及种族隔离（Segregation）三个维度的测量。这种以街区为基础的城市研究的人文生态学派在1970年代曾广受以罗根和莫洛奇（Logan and Molotch, 1987）为代表“关于地域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观点的强力挑战。他们认为，美国城市中街区（Neighborhood）之间的分化和不平等，并不是个人偏好和自愿迁移的结果，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资本积累和城市“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逻辑的影响。因此，城市社区似乎不能被看作是一个有土地使用、人口和住房竞争、互动和适应的自然区域。研究者需要对社区与更大的社会秩序连接的内部和外部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

然而，这些批评，并不意味着社区对个人来说已丧失了其分析的价值。1980代以后，威尔逊（Wilson, 1987）在其名著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一书中，吸收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分析，但依然继续承袭了芝加哥学派对空间研究的视角，对城市贫困的集聚效应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将这种集聚过程与更加广泛的宏观经济结构变迁联系在一起，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以及制造业从内城向郊区的搬迁，美国城市中社区之间的分化和不平等日益明显，即便中、高收入的黑人家庭和低收入的黑人家庭也是在空间上相互隔离。麦西和登腾（Massey and Denton, 1993）在《美国的种族隔离》（*American Apartheid*）一书中进一步阐发了威尔逊的这一思想，描述了由经济转型带来的日益社会分化如何与少数族裔群体的空间聚集交互作用，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结构条件，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群体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利地位。他们在人文-区位学派一度受到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派的批评后，重新将以街区（Neighborhood）为基础的研究带到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前沿。

此后二十年多年，关于街区效应的经验研究的文献迅速增长。根据桑普森（Sampson, 2012）的总结，这些研究获得了四点共识。第一是城市中各街区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种族隔离方面；第二是这些因素相互联系，因为他们与少数族裔或移民的空间隔离重合；第三，一系列与犯罪或健康相关的问题经常在街区层次集中发生，而且可以用贫困的集中度、种族隔离、单亲家庭比例等街区特征来预测。最后，在社会分层的另一端，描述社会进步的指标，如富裕家庭、懂计算机知识的人、精英职业等，也在空间上具有聚集性（Sampson, 2012）。

尽管这些事实看似没有争议，其背后的理论含义则不然。依照芝加哥学派的传统说法，如果街区的影响不是单纯地反映个人特征，那么一定是来源于超越于个人层次的社会互动和制度过程。因此以“芝加哥街区人类发展项目”（Project on Human Development in Chicago Neighborhood, PHDCN）及相关研究（以桑普森[Sampson, 2012]所著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为代表），一些学者致力于探究社会过程与社会机制来解释街区效应的存在，认为街区层次的多元行动主体（如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网络、地方精英等）和街区之外的力量超越于简单的个人层次特征的汇总，在社会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另外一些定量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则完全回归到对社会现象的个人层次解释，强调因果推论和选择性偏误，认为人们所观察到的街区效应主要是因为个人和家庭的自我选择所居住的街区带来的结果，而导致这种选择后果的是个人/家庭参差上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 PHDCN 稍后的“洛杉矶家庭与街区调查”（Los Angeles Family and Neighborhood Survey, 简称 L.A. FANS）设计中，在研究街区、家庭和同伴群体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时，特别强调居住流动和街区变迁的过程的作用（参见 Bruch and Mare, 2006），同时也关注社会福利改革项目对街区层次的影响。探究街区因果关系的最著名的项目，当属美国联邦政府住房部实施的名为“移向机会”（Moving to Opportunity, MTO）的关于住房研究的著名政策实验。MTO 随机将住房补贴券分发给贫困家庭，以诱导一些家庭迁移到贫困率比较低的街区，以准确无误地估计街区的因果效应（Briggs et al., 2010）。这种实验法的研究设计，在寻找因果效应方面固然有其严谨的逻

辑性，但却忽略了更加宏观层次的社会过程，因其结论缺乏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而常常受到批评（Sampson, 2012）。

无论哪一种理论解释，相比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及后来者对其的批评，关于城市中街区效应的研究，在方法论和实质研究问题方面积累了显著的成果。一是多层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的发展，使得分析街区层面的现象和个体层次的后果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连接，避免了罗宾逊针对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所批评的“生态学谬误”（Robinson, 1950）。二是研究街区效应更依赖于个体—家庭层次的微观数据，更加注重个体层面的因果关系的解释，体现在研究设计中，便是个体—家庭—街区多层次追踪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并与行政数据（例如人口普查）相结合进行分析。第三，关于街区层次的研究吸收了政治经济学派对芝加哥学派的批评，更加关注街区层次的社会现象与更大背景的宏观制度结构和过程间的关系。最后，关于街区的研究毫无例外地与移民、犯罪、不平等与贫困等城市治理中典型问题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具有公共政策的导向性。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特别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迁。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和城乡、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人口流动特别是跨地区的流动快速增长。以2000年到2020年人口普查为例，流动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144,390,748人增长至2010年的260,937,942人，增长幅度高达81.03%，2020年比2010年又增长了69.73%。人口流动又以跨县市和跨省迁移为主流，从内地到沿海，从农村到城市。以最新的统一标准划分城镇化水平，居住在城镇（现居住地）的人口在1990年时占全国人口的26.2%，2000年为36.9%，2010年为49.7%（Wu and He, 2015; Liang et al., 2015），而到2020年更上升到63.89%。中国的城镇化主要表现在一些大都会地区（北京、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等）的人口的持续增长，这些地区恰恰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中国正经历美国上个世纪初经历的“大迁移”时代。

与此同时，1990年后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城市长期以来以“单位制”为基础的资源（再）分配体制和社会控制体制逐渐瓦解。社会管理的重心开始逐步由“条”转向“块”、由“单位”转向居住的社区。随着城市化、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住房商品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居住社区以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为主轴的分化亦日渐显现。社区间的差异在扩

大，异质性不断增强（蔡禾、贺霞旭，2014；蔡禾、张蕴洁，2017）。社区内部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同质性相对而言也有所增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传统单位制式微的大背景下，居住人口的异质性、匿名性、流动性及其需求的多样性，加大了社会治理的复杂程度，对公共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近年来由房价推动的居住社区日益分化，使社区成为城市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落到实处的载体。换句话说，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居民会生活在城市中的不同社区。如外来农民工游离于特大城市各种管理体系外，集中居住在城郊结合部，而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则主要集中在居住在商品房小区。如何更有针对性地配置公共资源，满足居民需求，需要特别关注社区居住格局、居民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等在空间分布上的关系，把基层社区间的差异化的描述和刻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李骏，2018a）。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区”这一社会学名词，早已超出了社区研究 1.0 的学术研究范畴，而被更多地赋予了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的涵义。国内社会学界在费孝通教授的倡导下，社区研究虽起步较早，但研究视野和手段并未与时俱进，大有式微的趋势，话语权似乎逐渐被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所取代。

芝加哥学派关于街区效应的研究及其在 1990 年代的复兴，与中国的社区研究基本上是脱节的。国内的城市研究，还没有借鉴吸收西方（美国）城市情境下有关街区效应的大量经验研究和理论解释。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相关数据的缺乏，包括街区层次的人口统计数据 and 街区、家庭、个人等多层次系统数据集的缺乏；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一种“中国特殊论”的看法，认为中国以至于整个东亚社会，社区这个概念的起源和功能发挥的制度背景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例如，美国学者芮杰明（Read，2012）所著 *Roots of the State: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Beijing and Taipei* 一书也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思路，中国城市的居委会（社区）被看作是国家行政组织在基层的延伸，而非西方语境下的自发的、自主的、自治的组织，而在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社区更典型的形象是横跨于国家和社会，成为城市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Read and Pekkanen，2009）。

然而，这种“中国特殊论”的看法是基于对“社区”这一概念的古典式的误解，或者说是中文使用者对“社区”这一概念的误用。事实上，目

前中文所使用的城市“社区”概念更类似于芝加哥学派“街区”的概念，而并非完全是社会学教科书中“Community”原本所包涵的意思，亦非燕京学派早期学术实践中所理解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传统村落社区。在帕克将“社区”这个概念介绍给中国同仁90年之后，他眼中的“东方社会”也早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崛起的大都市也面临当年芝加哥城市发展类似的问题。芝加哥学派后来的传承和发展，也已超越了人文区位学的视角，吸收了更多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中国城市社区研究的大量文献，恰恰是从不一样的起点和假设出发，有潜力将中国基层社区研究提升到与西方城市研究理论视角和经验研究对话的层次，推进“社区研究”2.0。

“社区研究”2.0所强调的城市社区研究，不是简单的城市社会调查。城市社会调查更像是全国性调查范围的缩小。针对特定城市的抽样社会调查，优点在于比较聚焦，样本量又足够大。因为中国的地区差异实在太太大，对全国具有代表性，必然丧失一些地方性的题目。研究中国社会变迁，未必需要全国性的数据。城市，特别是大都市，引领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生活在城市，特别是在大都市。众多引领社会潮流的元素，都是在大都市首先出现的。所以，都市是光怪陆离、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的观察室和实验室。我们可能还是研究原来的题目，如不平等与贫困、移民融入、住房、教育、婚姻、家庭、劳动力市场等，只不过要在更加具体的场景下来研究，把严谨的定量分析建立在一定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数据虽然对全国没有代表性，但是可以挖得更深一些。“‘小’城市、大样本”，把单个的城市，放大了，仔仔细细地看得透一点，做得深一点。如果我们觉得地区（城市）差异中也可能有很多有趣的故事，那可以将这个研究扩展到其他相关的城市，即比较城市研究。这种研究思路和逻辑，更有点像定性研究中的个案扩展法。不过这里所指的是对单个城市情境的深入了解和分析，再扩展到其他城市。假定场景发生变化之后，原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是否会发生变化。

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社会转型，对都市研究提出了很多老问题，也激发出很多新课题。“社区研究”2.0一方面借鉴晚近芝加哥学派研究的新进展，强调城市空间因素与社会属性的交互，研究中国城市有没有空间的分化，空间分化会不会带来不平等效应，亚洲社会和美国社会中空间分化的差异如何。另一方面，“社区研究”2.0在研究中国城市社区时吸收对芝加

哥人文区位学派的批评，将社区定义为“居委会”/“村委会”这个层次，将其视为横跨于国家和社会的城市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国家行政组织在基层的延伸，而非西方语境下的自发、自主、自治的组织（Read, 2012; Read and Pekkanen, 2009; Tomba, 2014）。如何将这些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的研究与社会学中社区研究的学术脉络连接起来，联接社区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派的理论传统，也是社区研究 2.0 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早期芝加哥学派主要使用的人口普查汇总数据不同，“社区研究”2.0 的数据来源更加多元化。基于大规模的微观住户调查数据、政府行政数据（包括人口普查数据）等不同层次的数据，可以在空间上整合。通过区域层次数据与个人层次数据的整合，既可以做与个人行为相关的研究，也可以研究个人行为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研究还可以与城市大数据结合，通过新型手段搜集和整合传统面访不可能获得的资料。但是核心还是对空间因素的强调。我们关注的问题和视角与芝加哥都市社会学派很相近，“邻里”（Neighborhood）这个概念，不是新的东西。他们做的研究是“古典”的。“社区研究”2.0 可以说是中国城市研究的“新古典”都市社会学。

我们倡导的以定量方法从事都市社区研究，实践“社区研究”2.0，需要有项目作为突破口。“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简称 HKPSSD）为香港首个家庭追踪调查项目，最初以“家庭和贫困的代际转移”为主题，搜集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数据，追踪、监察、研究香港的社会和经济转变及其对个人的影响（Wu, 2016）。HKPSSD 是作为一个城市研究项目来进行样本设计的，抽样时考虑了街区空间因素，体现城市研究顶层设计的一些特色。例如，我们将选区当作邻里街区，利用政府公开的数据，建构一个测量香港居民空间分化的指标，我们称之为邻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Neighborhood Socioeconomic Index），即我们将香港的 400 多个选区进行了分层处理。利用香港 2006 年中期人口统计数据，从一系列指标中挑选了 4 个，以反映各选区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居住公营租住房屋的住户比例，家庭月收入达到港币 3 万元或以上的住户比例，具有大专或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职业为经理及行政人员、专业或辅助专业人员的人口比例）。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指标来概括四个指标所蕴含的信息，从而达到对数

据进行简化的目的。为了更直观，我们对其作了标准化处理，即将其转化为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00 的分布（见图 1，吴晓刚，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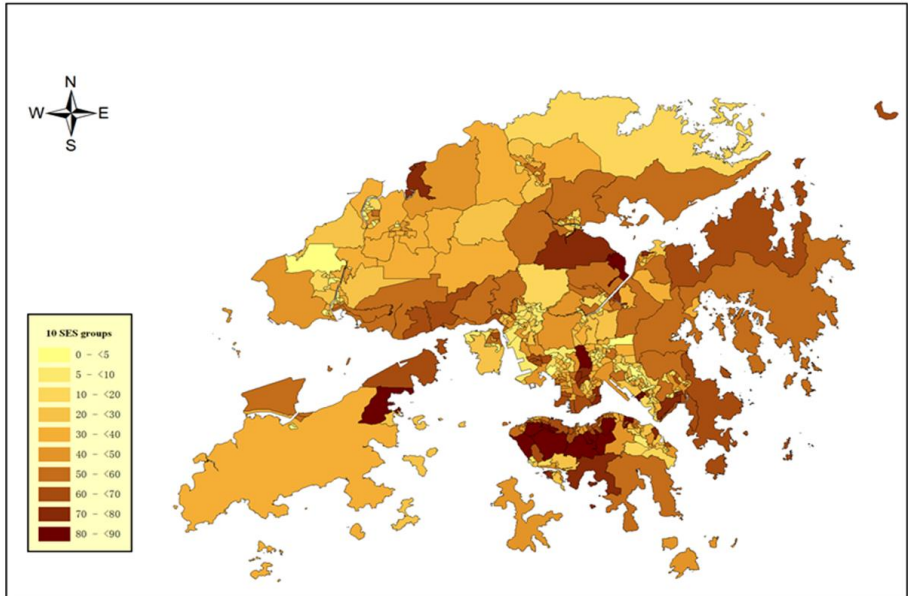


图 1. 香港各选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这一社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可以与 HKPSSD 微观调查数据整合起来使用。在 HKPSSD 项目第二阶段更以“社区与人口老龄化”为主题，明确将街区空间因素作为主要视角。HKPSSD 自 2011 年开始启动，目前已完成四期入户调查数据收集和 2019 年后续的网络（电话）追踪调查。HKPSSD 为香港社会科学基于证据的城市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资料库（吴晓刚，2022）。

HKPSSD 产生的研究思路也拓展到国内的比较城市研究。上海大学数据科学和都市研究中心执行的“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简称 SUNS）项目，参照借鉴但不拘泥于国外同类项目的设计，更明确地体现了这种城市研究的思路。项目于 2015 年完成社区层面的调查，2017 年完成第一期入户调查，2019 年完成第二期跟踪调查。2018 年，还针对 2015 年调查的居委会及其下属的小区（不包括村委会）完成了社区观察（吴晓刚、孙秀林，2017；孙秀林等，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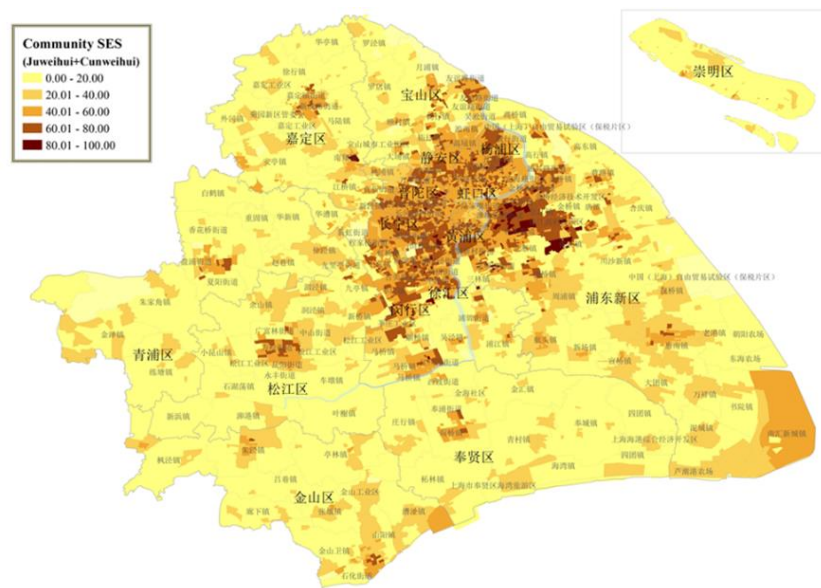


图 2a.上海市社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全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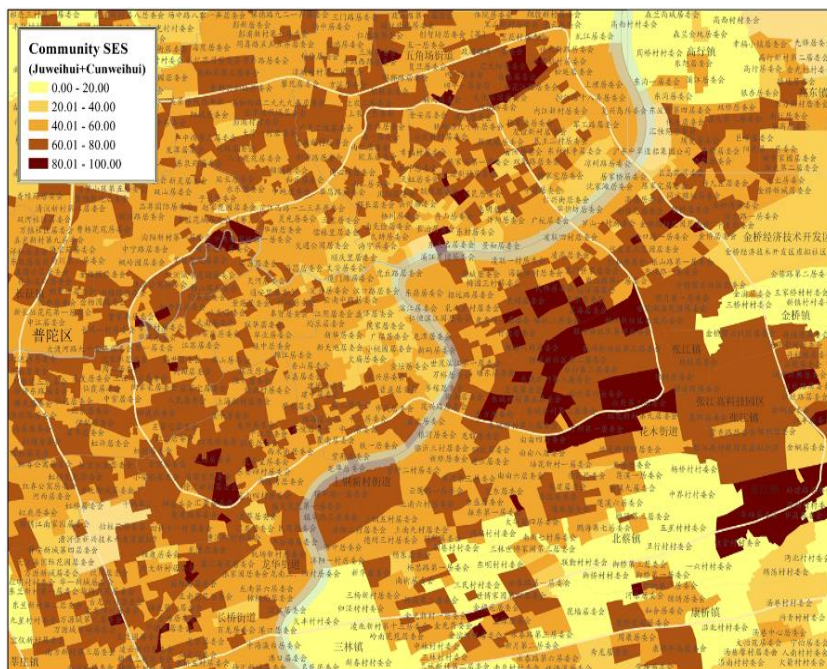


图 2b.上海市社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中心城区）

同样，利用 2010 年上海市人口普查数据，SUNS 项目选取了三个指标来反映社区的社会经济分化，即高中以上受教育居民比重、从事管理和专业人员职业占就业居民的比重以及城镇户口占居民人口的比重。经过主成分分析，提取一个共同的因子，并将其标准化，成为上海市社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见图 2a 和图 2b）。这个指数，已被应用在街区效应的相关研究中了（参见 Miao et al., 2019; Chen and Miao, 2023），后续也会根据数据不断更新。

“广州都市动态调查”（Guangzhou Metropolitan Panel Survey，简称 GPS）项目，延续和拓展 HKPSSD 与 SUNS 的设计思路，旨在构建一个可跨城比较、具有多层级代表性的综合性城市研究数据库。GPS 项目由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城市治理与设计学域于 2023 年启动，至 2024 年 1 月完成第一期入户调查，2024 年 5 月进行村居委调查，并对所有抽样社区开展社区观察。参考 SUNS 的做法，GPS 选取了基于 2020 年人口普查的受教育年限、城镇人口比例及基于外部地理大数据的房价信息，使用主成分分析构建了广州市街道层级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参见图 3），用以进行抽样阶段的隐分层，并使用街道、社区人口数量调整了各抽样单位的入样概率，以构建具有全市代表性的社区和家户样本。

“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KPSSD）、“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广州都市动态调查”（GPS）都是基于单个城市的大样本抽样调查。HKPSSD 的基线调查就完成了 3214 户，包括 7,218 个成年人和 958 个未成年人。他们的地址信息可以与相关的大街区或选区的人口普查汇总数据相连接。SUNS 项目 2015 年完成 537 个居（村）委会的调查，占上海 5,732 个居（村）委会的 10%。2017 年的入户调查基期数据则来自 180 个居委会或村委会的 5,120 户、8,631 个成年人和 1,892 个未成年人。2018 年完成的社区观察对象在“居村调查”和“住户调查”所涉及的 430 个居委会（不包括村委会）及其所有的小区共 1,316 个。GPS 则包括广州市 2,842 个社区中的 108 个社区、3,279 户、4,472 个成年人及 1,230 个未成年人的抽样调查数据，样本规模充分考虑城市内部社区和人口的异质性。值得强调的是，在 GPS 调查的 108 个社区中，有 44 个（约 40%）属于广州市定义的“城中村”社区，为讨论中国城市化中非正式居住（Informal Settlement）议题提供了宝贵的基础。以受访居民的地址信息，基于地理定位，一方面

可以将调查信息与社区观察数据连接起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后续追踪访问的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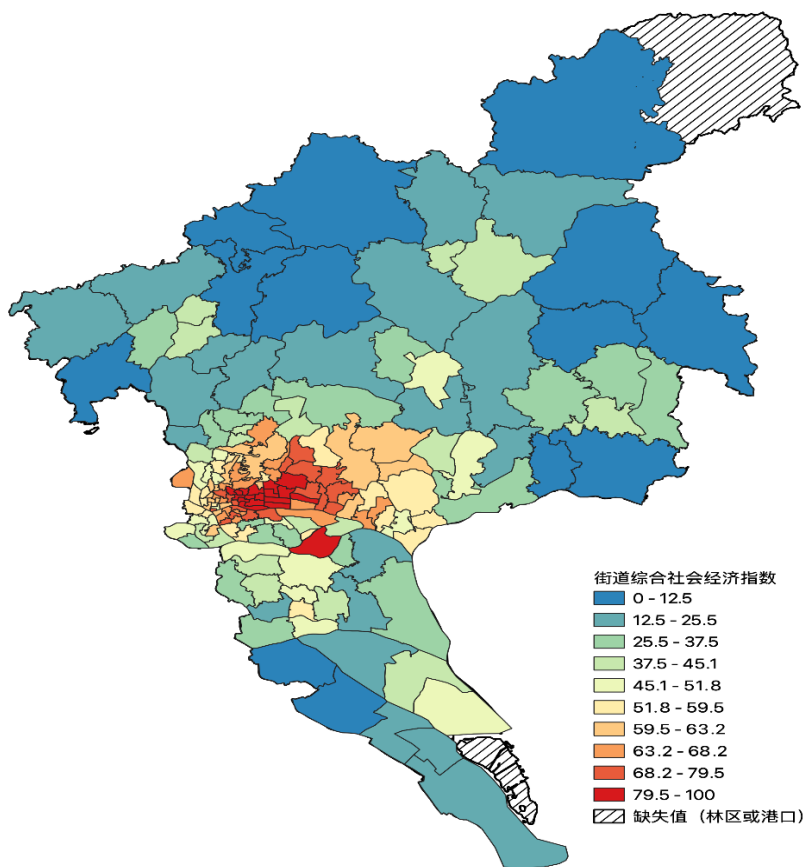


图 3. 广州市街道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HKPSSD, SUNS 和 GPS 项目搜集的包括邻里街区、家庭和个人等多层次数据库（其中 HKPSSD 和 SUNS 为追踪数据），可用于社区层次上的分析，更可以结合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行政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或就中国典型性城市作比较研究。三个项目问卷内容既包含共同模块，亦加入具有时代和地方特色的重要议题。一方面，相似的抽样策略和共同的基本信息、

就业、心态、社区模块可以构建高度可比的中國超大城市研究框架，探討自由市場、政府主導、基層（相對）較強的城市發展模式對社區居民社會凝聚力和集體效能感的影響，以及這些社區特徵對居民的生活中際遇與福祉的影響（Miao et al., 2021; Miao et al., 2024; 繆佳等, 2022; 曾東林、吳曉剛, 2023）。另一方面，借助於社區視角和豐富的地方信息，研究者可將香港、上海、廣州特有的城市議題置於社區情景中加以理解（如繆佳, 2023; 於閱等, 2022; Zeng and Zhang, 2022）。此外，社會學關注的不平等與流動、教育、養老、移民融入、婚姻家庭等傳統議題也可放在特定的城市背景下和具體的地方情境中研究（孫秀林等, 2017; 韓子旭、吳愈曉, 2023; 李駿, 2018b）。HKPSSD、SUNS 和 GPS 項目為城市社區研究 2.0 提供了成功範例，為中國比較城市社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數據。

四、結論與展望

學術研究和發展本來就是一個繼承與創新的過程。本文通過以中國社會學中發端於燕京大學的社區研究為例，展示了學科發展中國際化與本土化，個案田野調查與定量分析不同研究取向之間的張力。受芝加哥學派學者的啟發，燕京社會學人將“社區”這一概念首次引入中國，並以此為契機，與當時中國的國情相結合，推動社會學的本土化，在 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取得了矚目的學術成就。然而，這一被我們稱之為“社區研究”1.0 的學術取向，其後實際上是停滯不前的。1980 年代以後中國社會學中的社區研究，依然延續著這一歷史遺產，因而逐漸式微。社會學關於“社區”這一學科的核心的話語權，反而有被政治學、公共管理等學科取代的趨勢。原因可以總結為如下三點：

第一、社會學的“社區研究”早期在中國的發展，具有很強的學院派取向。社會學家實際上是想將单个社區看作一個小社會，主要在農村，希望通過“解剖麻雀”來了解整個社會運行的機制。我們現在更多是在在城市管理和區域治理的政策應用層面上使用“社區”這個概念。

第二、社會學的“社區研究”受美國芝加哥學派社會互動論的影響，後來又進一步借鑒了英國的人類學功能主義，注重人類學田野調查和個案研究。而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後續的發展，更加注重人口學和量化的研究，從早期研究對普查小區匯總資料的分析到 1990 代的個體/住戶微观調

查资料的获取,显示美国的城市社区研究不断吸收其他领域的发展成果而与时俱进。例如,抽样调查的方法和一系列统计分析工具,均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才发展起来的。城市研究,恰恰需要在“人口学”加“人类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抽样调查,多层次追踪数据,行政数据的结合使用和空间分析方法的发展,可以为城市社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最后,社会学“社区研究”面临的时空背景也发生了改变。当社区研究被引进的时候,193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而当社区研究重新被重视之时,城市中国已经崛起,超过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自1990年代以来,传统的城市单位制的衰落,以及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面对基层治理的种种挑战,社区的意义才被重新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现时的中国城市社区研究,才有与当年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等量齐观的价值。我们称之为社区研究2.0。

“社区研究”2.0版,简单地说,一方面是将以个案为传统的社区研究升级到多个社区的定量比较分析,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定性转向定量,从个案研究转向量化数据甚至大数据。另外一方面是将分析大规模抽样调查资料的定量研究置于更加地方化的情境,需要更加接地气的研究。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与社区研究1.0不同的是,“社区研究”2.0研究成果,可以为资源配置、基层治理、公共服务提供支持信息,因而在参与基层社区治理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提倡通过城市社区研究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城市特别是都市地区,是人类活动的密集区域。不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积累了良好的行政数据,而且在数字化时代,人们的行为轨迹数据也越来越容易获取。把我们通过调查搜集的微观个人、家庭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政府行政数据和匿名个人的大数据,在空间/社区的层面上整合在一起。大数据可以为社区研究可用。在这里,“空间”还是关键。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现象,都可以通过空间连接起来。

此外,也可以考虑在特定社区,引进非传统的资料搜集方法来补充和验证通过问卷调查搜集到的资料。总之,我们可以通过更好的研究设计,整合更多新的方法,使得搜集的数据更有针对性,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现象更深的理解。社区研究如何结合网络研究和分析方法,如何拥抱大数据,可能是未来社会学的社区研究的3.0版和4.0版需要致力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毕向阳. 2021. 社会形态学—人文生态学的知识谱系与“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J]. 社会(5): 80-116.
- 边燕杰. 2017. 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 [J]. 社会学研究(5): 1-14+242.
- 丁元竹. 2020. 中文“社区”的由来与发展及其启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J]. 民族研究(4): 20-29+138.
- 蔡禾、贺霞旭. 2014. 城市社区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133-151.
- 蔡禾、张蕴洁. 2017. 城市社区异质性与社区整合——基于 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分析[J]. 社会科学战线(3): 182-193.
- 斐迪南·滕尼斯. 1999. 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韩子旭、吴愈晓. 2023. 性别、非稳定业与生活满意度[J]. 城市与社会学刊(1):58-85.
- 侯俊丹. 2021. 从清河到禄村: 燕京社会学社区研究传统再考察[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38(3): 119-127.
- 李骏. 2018a. 移民威胁、经济剥夺还是治理失效——对上海市 60 个基层社区凝聚力的比较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 32(2): 23-30.
- 李骏. 2018b. 非稳定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内地与香港的比较研究. 社会学研究(5): 164-190+245.
- 卢晖临、李雪. 2007. 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01): 118-130+207-208
- 缪佳、吴晓刚、孙秀林. 2022. 社区、社会凝聚力与老年人精神健康: 来自上海的证据[J]. 城市与社会学刊(1):29-51.
- 缪佳. 2023. 有恒产者有恒心: 来自香港“居者有其屋计划”的证据[J]. 城市与社会学刊(1): 1-31.
- 齐群. 2014. 社区与文化——吴文藻“社区研究”的再回顾[J]. 浙江社会科学(3): 13-18+155.
- 孙秀林等. 2017. 中国都市脉动: 上海调查(2017)[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宁. 2017. 社会学本土化议题: 争辩、症结与出路[J]. 社会学研究(5): 15-38+242-243
- 吴文藻. 2010. 论社会学中国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吴晓刚. 2014. 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 设计理念与初步发现[J]. 港澳研究(4): 62-73+95-96.
- 吴晓刚. 2022. 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 2011年基线调查[M]. 香港: 国际华人社会学学会.
- 吴晓刚、孙秀林. 2017. 城市调查基础数据库助力社会治理[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年11月8号.
- 阎明. 2004. 一个学科与一个时代[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杨清媚. 2015.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J]. 社会(4): 103-133.
- 叶启政. 2016. 实证的迷思: 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於阅、蔡捷薇、李骏. 2022. 中国城市治理中的党员参与: 来自上海的实证研究[J]. 城市与社会学刊(1):82-104.
- 谢宇. 2018. 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J]. 社会学研究(2): 1-13+242.

- 曾东林、吴晓刚. 2023. 应急事件中的社区集体效能感：压力-缓冲效应[J]. 城市与社会学刊(1): 32-57.
- 张静. 2017. 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J]. 社会学研究(1): 24-30+242-243.
- 周晓虹. 2020. 社会学中国化：狭义或广义，伪问题或真现实[J]. 社会学研究(1): 16-36+242-243.
- Arkush, David R. 1981. *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 Monograph
- Burawoy, Michael. 1991.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Ethnography Unbou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iggs, de Souza Xavier, Susan Popkin, and John Goering. 2010. *Moving to Opportunity: 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Experiment to Fight Ghetto Pov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uch, E. E., and R. D. Mare. 2012.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Analysis of Residential Preferences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42: 103-54
- Chen, Wei, and Jia Miao. 2023. "Does the Internet Moderate the Neighborhood Effect? Internet Use, Neighborhoods,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i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 22-67. <https://doi.org/10.3390/ijerph20032267>
- Chiang, Yung-chen. 2001.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eman, Jame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pp. S95-S120.
- Liang, Zai, and Zhen Li, 2014. "Changing Pattern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during 2000-201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0(4):695-716
- Logan, John, and Harvey Molotch. 1987. *Urban Fortun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ssey, Douglas S. and Nancy Denton. 1993.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Undercla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iao, Jia, Xiaogang Wu, Xiulin Sun. 2019. "Neighborhood, Social Cohesion, and the Elderly's Depression in Shanghai."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ume 229 (2019): 134-14.
- Miao, Jia, Donglin Zeng, Zhilei Shi. 2021. "Can Neighborhoods Protect Residents from Mental Distres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vidence from Wuhan".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3(1):1-26.
- Miao, Jia, Xiaogang Wu and Donglin Zeng. 2024. "Promoting ageing in Place in Hong Kong: Neighborhoo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Depression among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17 (1): 142-159.
- Park, Robert and Earnest W. Burgess. 1921.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rk, Robert and Earnest W. Burgess. 1967 [1925]. *The C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ead, Benjamin L. 2012. *Roots of the State: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in Beijing and Taipe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Read, Benjamin and Robert Pekkanen (eds). 2009. *Local Organization and Urban Governanc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Robinson, W.S. 1950. "Ecological Correlations and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5: 351-57
- Sampson, Robert J. 2012.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harkey, Patrick. 2013. *Stuck in Place: Urban Neighborhoods and the End of Progress towards Racial Equal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hevky, Eshref, and Wendell Bell. 1955. *Social Area Analysis: Theory, Illustrative Application and Computational Procedur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mba, Luigi. 2014. *The Government Next Door: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William 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rth, Louis.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1):1-24
- Wong Siu-Lun. 1979. *Sociology and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London, U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Wu, Xiaogang. 2009. "Between Public and Professional: Chinese Soci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Footnotes: A Publication of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ay/June Issue http://www.asanet.org/footnotes/mayjun09/intl_0509.html
- Wu, Xiaogang and Guangye He. 2015. "The Evolution of Population Census in China, 1953-2010." *China Review* 15(1):171-206.
- Wu, Xiaogang. 2016. "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HKPSSD): Research Designs and Data Overview."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8(2):162-184
- Zeng, Donglin and Zhuoni Zhang. 2022. "Neighborhood Socioeconomic Status, Relative Household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Chinese Mainland Migrants in Hong Kong."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65-186

责任编辑：刘大炜